

第一章 社会发展与社会发展研究

社会发展是当今世界各民族广泛谈论的热门话题，社会发展研究则是时下各国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理论热点。人们从不同的社会条件出发，形成了视野不同、内容相异且外延十分广阔的社会发展概念。值此世纪之交，东西方社会都正在发生深刻社会转型之际，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研究更为艰巨的使命，有必要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坐标中，进一步析理人们的社会发展观念，明确社会发展研究的任务与方法。

第一节 社会发展观的历史演化

一、古代社会发展观

社会发展是与人类同时存在的历史过程。自人类从自然界中站立起来开始社会生活，社会就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然而，虽然人类从来就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但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却经过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地明确。

不用说在洪荒太古时代，就是到了已经有了光辉灿烂文化的欧洲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先秦时期，人类还未曾懂得社会有其自身发展过程。古希腊的先哲们把社会看成同自然界一样是由水、气、土、火等元素构成的，社会的发展变化不过是自然元素的分离与组合。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甚至把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看成不真实的幻象，而其真实的本质则是悬浮于太空的神秘理

念，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中国先秦思想家们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人生现世，但是同古希腊人一样，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社会同自然的本质区别。老子认为天人合一，孔子宣扬天授人命，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尽管论述得很精深，但是其本质不过是对人生现实和客观自然界缺乏反思的认识，是对人生和自然的笼统猜测。

到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社会发展概念就更加难以形成。因为欧洲中世纪是神学的世纪，一切都披上了神学的外衣，科学与文化则成了神学的婢女。不仅那些教士、教徒们用神学来解释世界，而且那些哲学家们都从神学立场来说明人生。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不过是上帝在天国中的导演所致，历史若有进步，只能理解为按上帝的意志从世俗之城向上帝之城的演升。先秦后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情况比欧洲毫不乐观。虽然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像西方人那样执着与普遍，中国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说明要比西方人直观和真切得多，但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人们难以感受到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对社会发展的理论说明也常常在循环论中周旋。

统观东西方古代社会发展观念，会发现尽管古代社会发展观念往往流于表层，但是其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古代人都形成了许多内容各异、甚至冲突对立的不同社会发展观。择其要者而述之，我们可以把古代社会发展观划分为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类。

在中国，古代自然主义社会发展观主要源于老子和庄子，即所谓道家。在老子和庄子看来，人生、社会同自然本为一体，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不要希求过高，存于自然就应安于自然，没有必要给自己提出种种目标去牵制自己的灵魂与形体。

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的自然状态。孔子和孟子的社会发展观同老子和庄子正相反，他们主张积极有为，提倡德行教化、礼义安邦。为了实现自己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政治理想，孔子风餐露宿地周游列国，忍辱负重地游说诸侯。虽然一生常常陷入政治和生活的困境，但是他总是不折不挠地为实现自己的治国方略而四处奔波。孔子的积极进取同老子的消极无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就是中国古人在社会发展观上的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后来在秦汉魏晋、隋唐南北朝，直至元宋明清都可以看到它的延续。

在欧洲古希腊时期，理想主义社会发展观占了上风，它的典型代表是柏拉图的社会发展观。虽然柏拉图认为现实生活是不真实的，但是当他直面真实的现实生活时，他就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在著名的《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社会作了等级划分，提出了在婚姻、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严格等级制，并建构了训练、教化和控制社会的方案，试图把处于分化冲突、动荡不安的古希腊社会治理得秩序井然、幸福和谐。

虽然柏拉图的主张有很大影响，但是他的学说也不是所有学派都赞成的，比较著名的斯多亚学派和怀疑主义者，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就持与柏拉图不同的观点，斯多亚学派信守的一句格言是：“顺从自然 或本性 而生活。”他们认为：人不当被“快乐”、“烦恼”、“欲望”、“恐惧”等激情奴役和支配，这些激情可以支配人们产生种种理想，作出种种违背自然本性的行为，使人的灵魂和肉体都陷入病态。他们倡导的行为准则或思想境界是“断激情”、“不动心”禁欲、苦行、安于自然。怀疑主义者对社会生活的态度与斯多亚学派类似，它的主要代表皮浪宣称：对待一切事物都采取淡漠无情、无动于衷的态

度，理想和行动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既不能从我们的感觉也不能从我们的意见来说事物是真的或假的。所以我们不应当相信它们，而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不作任何判断”。^①

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斯多亚学派和怀疑主义者的自然主义，虽然在欧洲中世纪被神学外衣掩盖了，但在欧洲近现代社会发展观念中却得到了继承，甚至表现得十分极端。

二、近代社会发展观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形成的欧洲近代社会发展观，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发展观，它从对人性的追求开始，转化为对科学的倡导和对功利的热望，直至现代演化为极端的科学主义和工业理性主义社会发展观。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生产与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自我意识，提升了的自我意识又推动着人们更积极地发展生产与科学。在这种力度越来越大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们认识到：人既不是不能从自然界中走出的自然存在，也不是只能由上帝创造的被造物，人是主人，是世界上能够制造出新物品并且创造自己新生活的真正创造者。

既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但丁向人们宣布，人是高贵的，并且人的高贵在于他有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自由。他说：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获得自由，“人类的本分工作，就整个来讲，乃是能完全实行其理解力的范围与发展；首先能够思想，以分辨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页。

的。”^①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薄伽丘明确地称：人不是用木头和金刚钻造的，而是用血与肉造出来的，是高于一切自然物具有理想和道德的人，是应当获得幸福和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那么，人怎样才能发展自己呢？瓦拉主张充分肯定个人利益，让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而不是一切听命于上帝，皮科则号召人们“按照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取得你所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②

在人文主义者留下的大量文献中，处处可以看到充满信心地发展渴望。不过，人文主义者所渴望的发展主要指个人及其本性的发展，其内容是个人的意志、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的享乐的追求与实现，真正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来研究社会发展尚未开始。人文主义关于人性展开与实现的要求后来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思想家们那里得到进一步继承与发挥。以培根、洛克等人为代表的 17 世纪思想家，把人性的展开与实现归结为发展科学、征服自然。而以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 18 世纪思想家，则把人性的展开与实现归结为遵循理性，按理性原则来建立社会新秩序。

培根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③ 培根认为：在“所能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之中”，最伟大的莫过于发现新的技术、新的才能和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那么，靠什么才能发现新技术、增长新才能、获取新物品呢，只有科学知识。培根指出：“人的知识

^①（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第 19 页。

^②班加明·法灵：《弗兰西斯·培根》，三联书店，1958 年版，第 43 页。

^③《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 年版，第 9 页。

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① 即知识就是力量。通过科学知识形成新技术、新才能的力量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力量，是发展工业、制造物质产品的力量。科学知识及其转化的力量之所以是最伟大的，就在于它能使人类摆脱贫困、祛除愚昧、开发自然、获取财富。

培根对科学的崇尚，后来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和洛克等人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在 17 世纪实验科学蓬勃发展、不断取得惊人成就的鼓舞下，笛卡尔、斯宾诺莎和洛克等人更加重视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们做的不是一般性号召人们发展科学，而是把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提升为一般的或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坚信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认识的任务在于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掌握了客观世界本质的科学认识具有普遍性，按照科学认识去控制和索取自然是天经地义的行动，因为它可以真正实现人的价值。这些被普遍化的原则后人称之为“科学理性”。17 世纪哲学家们概括出的这些原则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它们不仅是指导科学认识与科学活动的原则，而且也是工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原则。因此，科学理性的实质是要求人们按照实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来指导或规范自己的所有行为，包括用科学原则或科学精神来设计人生、管理社会和推进社会发展。

17 世纪的哲学家们主要是从理论上特别是从观念论上论证科学理性的真理性和普遍性，而 18 世纪的思想家们则在更普遍的社会生活层面上来论证科学理性的真理性和普遍性。法国启蒙主义者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人不仅像 17 世纪思想家那样推崇科学理性、主张大力发展科学，并以科学推进工

^①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第 19 页。

业实践，而且他们更注意的是用科学来反对神学。他们认为宗教神学是虚伪和谎言，是对人性的压抑和对社会发展的限制，而科学是真实和真理，是对人性的解放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在反对神学的斗争中，他们更明确把理性的内容概括为自由、平等、民主，他们要求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应当拿到理性的殿堂上来裁判。在他们看来，人生存在、人际关系、社会风俗、社会制度、国家法律和国体政体等所有社会构成或社会问题，健康还是腐败、善良还是丑恶，都应当拿到理性面前来审查，他们不断提出的问题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法国启蒙主义者用科学反对神学，用理性冲击神性的斗争，比 17 世纪哲学家的理论阐述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和革命性，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斗争使人们突破旧传统、旧观念，使社会建立新制度、新生活。在充满激情、富有批判性的言辞中，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也阐述了大量经验层面的社会发展问题，如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政治体制、阶层阶级、生活方式和科学教育等等。他们不仅用理性原则来评价各民族在这些方面的利弊得失，而且按照理性原则提出教化、提升和改善各民族在这些方面的理想目标；在讨论经验层面的社会发展理论的起源时，人们一般是从 20 世纪初至多从 19 世纪后叶开始，如果看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会发现直接面对经验层面的社会发展研究在启蒙主义者那里就已经论述得十分丰富了。

到了 19 世纪，本来已经深入经验层面的理论探索又出现了回复。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不像启蒙主义者那样去用理性来批判经验现实，而是把经验事实的变化不断地概括为理性原则或理性逻辑，试图在深层的哲学思考中揭示社会发展的深刻本质。康德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审美理性

到历史理性，论述了科学、道德、艺术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根据，试图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合理发展提供指导原则和展开基础。黑格尔用更为抽象的绝对理念来解释社会历史乃至整个世界的一切变化过程，以晦涩而严整的概念逻辑推演出人类社会和自然存在的发展图景。

康德和黑格尔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充满了系统性和历史感，他们试图把人世与自然的一切发展变化都纳入自己的视野，他们的理论无疑是关于发展的理论，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更是一种空前深刻而丰富的发展理论，其中自然包含了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然而，这种不断地把现实社会发展问题概括和描述为概念逻辑的理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更不是社会学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理论，可以说，它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发展理论。

三、现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明确地从经验事实出发，直接地指向实际社会问题的社会发展研究，开始于 19 世纪上半叶。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哲学家孔德面对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的社会动荡，深感有必要建立一种能指导资产阶级迅速确立社会秩序，有效推进社会进步的理论。在孔德看来，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的形而上学理论，高悬于现实世界的上空，以抽象晦涩的概念逻辑演绎社会变化过程，给出的都是难以理解和无法操作的抽象观念。今天已经步入工业社会，应当脚踏实地地从经验事实出发，像物理学那样把握社会现象的种种客观规定性，建立一种可以用经验事实证明，并且可以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孔德把他要建立的理论称为社会物理学，后来又称为社会学。

在孔德、迪尔凯姆等古典社会学家那里，社会学是以其实

证性同形而上学对立的，他们向人们张扬的是从抽象逻辑转向经验事实，他们标榜的是像物理学那样只问是什么，而不问应当是什么。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进步与秩序，实际上，他们提出了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进一步说，孔德、迪尔凯姆等人不仅创立了社会学，而且也创立了直接面向经验事实的社会发展理论。

只问是什么，不问应当是什么，这实质上突出了研究的客观描述性，否定了研究的主观评价性或理想建构性。事实上，社会发展研究不可能只问是什么而不问应当是什么，在孔德和迪尔凯姆极力强调描述性研究的论述中，随处可以看到他们对社会进步的理想和对社会和谐的希求。孔德和迪尔凯姆如此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无疑受到了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且取得惊人成就的自然科学的影响，他们实际上是脚踏着资本主义工业实践基础，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为根据来建构社会发展理论。

孔德和迪尔凯姆倡导或确定的实证主义传统，在后来的社会发展研究中具有很大影响，从凡勃伦、帕森斯等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实证主义传统在社会发展研究中始终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实证主义传统并非受到所有人们的认同。最先反对实证主义研究社会发展的方法和观点的是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社会存在与发展首先是个人思想意识的变化，因此，研究社会存在与发展首先应当从人的主观性或从具有主观意识的个人出发，而不应当把社会看成一个纯客观的现象。韦伯提出重视人们的意愿、追求和价值评价，并主张用体验和移情或投入的方法去研究。人们把韦伯的理论称为人本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它掀开了社会学理论或社会发展研究的新篇章，表明社会发展研究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潮流。

韦伯的理论对后来影响很大，在米德、哈贝玛斯、利奥塔德等人的著述中，人本主义的传统得到了不断的发扬，尤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人本主义的理想性和评价性，已经不是对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和实然性的简单否定，它已经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上开展了对整个欧洲文化传统的批判，同时，也开始探索突破传统观念的新发展道路和新发展模式。

在孔德、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等人那里，社会发展的内涵即资本主义现代化，具体表现为思维理性化、生产工业化、知识科学化。韦伯又提出一个制度科层化。到了今天，现代化已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发展，尤其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社会发展实质是对现代化的否定，包括对传统理性、工业生产和科学知识的否定，后现代主义者追求的是自由、不确定、非中心、多元化和相对性等等后现代性，他们试图以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以便在重建文化传统、重构思维方式和理想目标的斗争中，塑造一代新人，建设一个新社会。

总之，社会发展观和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重建的过程，它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有了很大变化，它在设计、追求和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实现着自身的发展。

第二节 社会发展研究的任务与意义

一、社会发展研究的任务

社会发展研究无论发生了何种程度的演化，也无论产生了多少理论流派，由孔德在创立社会学时提出的秩序与进步问

题始终是它的基本问题。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秩序与进步问题被不同理论流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且不断地被赋予新内容，给予新评价。

在 19 世纪前半叶，孔德和迪尔凯姆探讨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变时，他们所指的进步是哲学思辨向科学实证的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专制社会向法制社会的转变；他们所指的秩序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急于确立的、保障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良性运行的新秩序，包括社会整合、社会法制、社会调控、社会和谐等问题。在进步与秩序二者关系中，他们更注重的是秩序问题，孔德曾明确指出：“秩序是进步的基本条件”，并且“所有的进步最终都趋向于巩固秩序”。^①迪尔凯姆理论研究的主题是社会团结或社会整合，其实质也是如何使动荡不安的社会进入一个具有较强凝聚力和运行有序的新秩序中。

韦伯、齐美尔等人在研究社会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上同孔德与迪尔凯姆是冲突对立的，即人本主义同实证主义的对立，但是，他们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同样的。韦伯的现代化理论，一方面揭示了宗教意识等主观性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充分论述了维持现代社会健康运行的新秩序——科层制。齐美尔虽然把自己理论研究的主题确定为社会冲突，并肯定了社会冲突在社会整合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他论述冲突的目的是想让社会在矛盾运动中进步，在矛盾关系的展开中使社会有活力地有机整合，实质还是进步与秩序问题。

帕森斯对社会发展或社会现代化的研究，是以结构功能模式理论展开的，他认为社会只有在适应、目的、整合、维持等

^①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第 4 卷，第 56 页，转引自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16 页。

四种结构功能的动态谐调中才能实现有序发展，进步与秩序问题在结构功能模式的研究中被深化和具体化了。而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尽管他们认为过份强调社会秩序的作用是有碍社会进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经济秩序、政治制度还是文化规范，都是社会生活的异化，是对社会的控制和对人性的压抑，所以应当批判秩序，而不应当不问应然性地单纯强调秩序。其实，法兰克福学派不是否认一切秩序，他们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秩序，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取代现有秩序真正使人性得到解放的新秩序。

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工业化或现代化被他们看成人类的理性迷失甚至是自我残害，法制、科层制等社会秩序则成了被他们猛烈攻击的对象。不过，即便在后现代主义者如此激进的理论中，进步与秩序仍然在一种更深刻的层面中被追求着。在他们的直接论述和理论表层中，能够看到“无中心”、“反结构”、“分延”、“摧毁”等许多反秩序的激烈言辞，但是在他们彻底否定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文化传统的强烈要求背后，仍然蕴含着对人类发展新内容、社会存在新秩序的渴求。“解构”和“摧毁”不过是手段，“解放”和“重建”才是目的。

进步与秩序作为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不仅是各种理论流派都要回答的问题，而且也是在社会发展研究的各种内容中都要体现出来的问题。一般说来，社会发展研究的内容可以划分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三个层面。在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中，社会发展理论总是要提出它们怎样才能进步，并且还要问它们在何种秩序中能够获得谐调稳定的进步状态。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进步与秩序问题，也是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学以及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但是，它

们研究这些问题同社会发展研究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发展研究总是要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与秩序放到有机联系中来考察，而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则是主题化或专门性的。

在社会系统各种构成要素或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的有机联系中，对各种社会发展问题综合性、整体性研究，是社会发展研究区别于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一个基本特征。进一步说，在社会发展研究中涉及的各种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发展研究独有的任务，或者说社会发展研究所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分别是不同学科的研究任务，社会发展研究不过是把这些不同层面或不同领域的问题放在一个总体联系中考察，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实质上是综合了各学科研究对象的

任务。

具体说来，社会发展研究的任务包括：在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中，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社会变迁的动力与形式、社会发展的趋向、类型和机制，社会发展的目标、条件和道路，社会发展战略的构成、设计和实施，社会发展指标系统的分类、设立和评价等等。同时，社会发展研究还要对各种社会发展理论进行反思，进而总结从各种角度和不同视野进行社会发展研究的利弊，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社会发展研究的具体任务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为不仅社会生活或社会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而且人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中为社会发展研究提出的任务也是不断变化的。可以说，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任务都是主观认识和客观现象的统一。这等于说，没有纯客观的理论研究任务，这点对社会发展研究来说更为突出。社会生活或社会问题从来就是多元复杂的，社会发展研究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自

己的视野，也不可能把与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都一下子提到自己的议程中来。无论哪种流派的社会发展研究，都是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社会需要出发来观察社会、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如果说社会发展研究的任务都是一些客观现象的话，那么应当指出，这些被作为研究任务的客观现象是研究者在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中选择出来的。

由于社会发展研究任务具有主观选择性，因此，它就不是完全外在于研究者的单纯客观性，其中体现了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文化传统、价值尺度和社会背景。当研究者观察社会生活、为自己提出研究课题和研究任务时，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在起作用。简言之，社会发展研究者们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一样，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的，是受自己不可摆脱的种种规定性的制约来提出研究任务的。所以，应当充分估计到社会发展研究任务的主观性，应当把它看成主观理解与选择同客观事实的辩证统一。

二、社会发展研究的特点

社会发展研究的特点首先是由它的研究任务决定的。因此，在分析社会发展研究的任务时，已经揭示了它的研究特点。为了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地理解社会发展研究的特点：

首先，社会发展研究具有显著的综合性。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研究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层面的社会问题，都是在相互联系中被把握的。譬如经济问题，社会发展研究把经济问题的解决和经济过程的顺利开展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方面，经济发展研究是社会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社会发展研究与经济学不同，它研究经济问题时总是要把它放到特

定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和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中来考察。在经济学那里，经济现象可以同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分开来研究，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等等可以成为专门话题来论述；而在社会发展研究中，这些经济现象要不断地同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

研究的综合性保证了社会生活能被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斯宾塞曾把社会生活不同方面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生物有机体，生产、流通和控制等社会分工被认为像人体一样，是由营养、循环和神经三个系统来分担的。在社会结构中，这三种功能或三种任务分别是由工人阶级、商人阶级和工业资本家来承担的，并且这三种功能必须在同一个有机整体里才能发挥作用，离开了有机整体，无论哪一种功能都一定要失效。人们经常指责斯宾塞对社会有机整体性的解释是一种庸俗化，其实，还应当看到斯宾塞对社会构成有机联系的体验是真实的。在社会发展研究中，只有不断地把各学科专题化的社会问题重新综合在一起，社会有机体才能在当今不断展开的学科分化中从分割走向整合。

其次，社会发展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对社会现象开展综合性研究的还有其它一些学科，例如史学中的通史研究。史学家们在研究人类历史演化线索时，经常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中把握社会发展变迁。但是，史学研究同社会发展研究不同，史学面对的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而社会发展研究则直接面对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虽然某些史学家主张以古鉴今、以古训今，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是无论他们对现实关心的如何急切，他们的视野、意愿和观点都一定要通过历史的考证与解释才能折射出来，因此是间接的。社会发展研究对现实的关注是直接的，虽然社会发展研究有时也要考

察某些问题的历史根源，但这仅仅作为直接解释现实问题的一个环节或手段。更为重要的是，不仅社会发展研究的问题是从现实中提出的，并且它形成的理论观点一定是能够面对现实并解决实际问题的。

再次，社会发展研究具有明确的参与性。这个特点与社会发展研究的现实性直接相关。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观点在社会发展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当社会发展研究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它从来不是单纯地描述客观事实，总是要指出问题的症结，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战略设想，用黑格尔的话说，现存的未必是现实的，现实的必须是合理的，不合理的现存应当按照理性原则重新建构。社会发展研究参与性的主观根据是研究者的理想性，研究者在接触社会问题之前或实际研究过程之中，不仅要观察、描述它们，而且还要分析和批判它们，而分析和批判总是要有所依循，即总是根据某种目标、尺度来展开分析批判。于是，就产生了理论的理想标尺同现存事实之间的张力，它的结果不是研究者回避现存，而是要根据人们的利益和意愿来改变现存。

社会发展研究参与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其理论著述的评价性。评价与描述不同，描述追求的是客观性，而评价伸张的则是主观性。人们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意志和需求作出美丑善恶评价的。评价本身就是参与，是把主观意识参入面对的社会现象之中。社会发展研究的评价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当代正在流行的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们不断地宣称，没有离开价值判断的客观性研究，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要求现存按照人们的价值观加以改变。实证主义者反对价值评价，主张价值中立，排除主观参与性。其实，没有哪个实证主义者做到了这一点，当他们主张从哲学思辨转为科

学实证时，就已经向人们明确地显示了他们的价值判断：抽象的哲学思辨是无意义的，只有科学的实证性研究才是正确有效的。

社会发展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希望或追求的社会发展是一个渐进性过程。对社会发展问题采取综合性、现实性和参与性研究的还有各种社会革命理论。不过，社会革命理论同社会发展研究不同，它希望和追求的发展是社会性质的变化，即质变，是颠覆和摧毁，是急剧的爆发或飞跃；而社会发展研究希望和追求的发展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渐进性的变化，即量变，是优化和增长，是在一定秩序中开展的平稳和缓的演化过程。即使在比较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发展也不是暴力革命和社会形态的颠覆，而是文化传统的拆解和人类灵魂的重塑。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在两次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迪尔凯姆、帕森斯等人亲眼目睹了战争与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创伤和动荡，他们一般认为剧烈的社会冲突与变革只能把社会从一种混乱引向另一种混乱，而只有渐进式的进化才能使社会实现健康的进步和稳定的秩序。因此，许多社会发展理论家们不仅不愿见到冲突与革命，而且也不愿在自己的理论中去论述社会的爆发式飞跃。事实上，从渐进性来研究社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经历的发展形式并非都是惊涛骇浪式的社会革命，相反最长久的发展形式倒是缓缓而行的微波细浪式的社会变迁。因此，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渐进性研究，不仅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基础，而且也应当是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内容。